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成果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 杨剑龙 主编

# 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 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

程郁 朱易安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442.9

000000110

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程郁, 朱易安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495 - 4189 - 8

I. ①上… II. ①程… ②朱… III. ①妇女—社会生活—历史—上海市—近现代 IV. ①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7704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编辑: 刘冬雪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黄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102)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30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尽心尽力

###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总序

杨剑龙

早在2002年,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就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由我填写申报的表格。当年因为都市文化研究没有学科的落脚点而未获批准。2003年,由我领衔再次申报,填写申请表格,组织相关人员,搜集有关资料,进京修改表格,迎接专家组现场考核,甚至当场背诵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4年底,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归入学术综合类基地。地方院校获得这样的基地是十分不易的。在学校的支持下,在诸多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有序地开展了起来。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有当代都市文化、国际都市文化比较、都市文化史三个研究方向,聘请了三十余位专职与兼职的研究人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采取项目管理的模式,每年申报两个重大项目。2004年以来,中心已设立了18项重大项目。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以来,基地人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项、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2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1项,另有上海市教委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及其他横向项目几十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三十余项。中心积极承担政府和社会的决策咨询任务,主持了多项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并多次获得

政府决策咨询奖。自 2009 年始,我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为市政府的决策出谋划策。

按规定重点研究基地每年要主办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诸多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的学术会议,如上海与首尔、上海与东京、上海与纽约、上海与温哥华、上海与巴黎、上海与博茨瓦纳、上海与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首尔市立大学等,还举办了不少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小型的学术沙龙等。中心积极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及相关活动,并得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执委会的表彰。中心有《都市文化研究》学术刊物(CSSCI 类集刊)和都市文化研究网站。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熊月之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25 本(上海辞书出版社),苏智良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都市文化及其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出版《上海城区史》上下卷(学林出版社),杨剑龙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嬗变”出版“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丛书”8 本(上海文化出版社)等,中心研究人员出版学术著作、研究译丛,发表学术论文,仅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就有 14 篇。中心主持的“城市与社会译丛”、“都市文化研究译丛”、“都市与文化译丛”对于国外城市理论的引进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2010 年 5 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次评估,在学术综合片 25 个基地中名列前茅。

基地建成以来,教育部社科司领导袁振国、张东刚等多次亲临基地视察与指导,研究中心也得到了上海市教委历任领导的扶植和指教,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领导的关心和帮助。2007 年 9 月 6 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委秘书长丁薛祥、副市长杨定华,在市科教委党委书记李宣海、市教委主任沈晓明的陪同下视察都市文化中心。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上海市高教学会会长张伟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炜、中共奉贤区委书记时光辉、区长庄少勤等,都曾到研究中心考察指导。

都市文化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是人们在都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既包括物质形态的城市建筑、园林、教堂、公共文化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等,也包含精神形态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艺术、宗教、法律、习俗及市民的生活方式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化的典型。在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呈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尽心尽力,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呈现了基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丛书包括杨剑龙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郑崇选的《都市文化生产与文化形态转型》、王琪森的《海派书画艺术研究论》、程郁和朱易安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钱智的《长三角都市文化:演进与体验》、施晔的《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杨剑龙的《坐而论道:当代文化文学对话录》、朱鸿召的《文化民生论》8部,涉及了文化批评、文化生产、书画艺术、职业妇女、区域文化、城市小说、文化文学、文化民生等诸多方面,呈现出都市文化研究丰富与复杂的多重面相。

自2004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已走过近十个年头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都市文化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在研究中心体制欠完善的境况下,作为基地主任的我虽任劳任怨、竭力支撑,每年策划两个重大项目的申报,每年主办国际会议,每季度撰写基地汇报,每年呈送基地年度总结报告,等等,却常有独木难支、力不从心之憾。在中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下,我仍将会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尽心尽力。

2013年3月8日



## 口述史：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性别观察

朱易安

上海城市的性格和品格，多少给人一点“阴柔”的感觉。

20 世纪 90 年代，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其实涉及了都市文化建构中的性别因素：“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 20 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sup>①</sup>

我们暂不评价这种描述是否具有代表性，但至少可以反过来证明，上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被轻视的；同时也说明，都市文化中的性别因素，应当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不仅涉及都市文化中两性

<sup>①</sup> 龙应台：《啊，上海男人》，《文汇报·笔会》，1997 年 1 月 7 日。

和谐关系的建立,同时也涉及城市性格和品格的形成。

许久以来,对于上海地区这种所谓“阴盛阳衰”两性关系的描述,屡见不鲜,但是,关于如何形成这样的关系却未见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上海职业女性群体崛起的传统。事实上,上海地区职业女性群体的崛起,与长江三角洲女性长期承担家庭经济的传统有关,而近代工业化的机遇又让农村女性成为城市工人,从而构建了新型的两性关系。

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近代社会中女性职业者队伍的形成,与近代化、工业化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新兴职业的出现有关。江南地区的女性,在明清以后已经是家庭生产中的重要劳力和经济来源。乾隆年间,乌泥泾农妇一日织布一匹所得银钱要高于农村短工一日工食银一倍以上。<sup>①</sup>《清稗类钞·风俗类》中记述苏州四乡妇女“杂男子力作,樵渔蚕收,驾舟担物,凡男子所有事,皆尤为之”<sup>②</sup>。正如徐光启所说,松江地区农民“三百年而尚存生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杆而已”。<sup>③</sup>这种传统导致江南农村青年女性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更容易走出家门,自食其力,补贴家用,渐渐形成职业女性的基础人群。

曾见以“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 1915—1923”为题,研究这一时段中国的女性职业范围,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轻工业,如纺织、烟草、火柴、化工、成衣等行业的女工;帮佣——即到中产以上的家庭当姨娘、奶妈;供职于文化教育机构,如教员、新闻记者、传道师、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等;普通职员,就业于社会各机关,如官署、商店、公司、医院的女书记、女医生、女店员、护士、产科医师等;娱乐机构从业人员,如歌女、电影演员、舞女、女伶乃至妓女等。<sup>④</sup>可见,短短八年中,女性职业范围的扩大突飞猛进。另外,职业女性的人数也十分可观,1920年,约七十五万的上海妇女中,有正当职业者(包括学生、教师、医生、看护妇、编译者、宣教者、音乐家、画家、商人、船户、

① 樊树志:《乌泥泾——绩布二物,衣被天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② (清)徐柯:《清稗类钞·四十二风俗类:苏乡妇女之俭勤》,中华书局,1985年,第2202页。

③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蚕桑广类》,中华书局,1956年,第707页。

④ 张三郎:《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 1915—1923》,台湾师范大学1986年硕士论文,第92页。



渔人、农妇、工人、伶人)约有30万人,占了整个女性人口的将近一半左右。<sup>①</sup>另据《女声》杂志1943年的调查结果,职业女性的就业领域已可归为教育界、医学界、商业界、法律界、党政警界、娱乐界、手工及佣工、农耕畜牧、机器工业等九大类。足以证明,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职业女性的城市,也是从业妇女人数最多的城市。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陈雁的《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形成》是较早发表的成果,她指出:“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人数和就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职业女性群体的逐渐成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职业女性群体中人数最多的,应数产业工人,其中,又以缫丝业和棉布业最多。19世纪60年代,随着机器缫丝工厂的出现,上海第一代纺织产业工人最早诞生于外国人创立的工厂中,肇始仅数千人。到19世纪末,首批中、外棉纺织厂建立,使上海纺织产业工人达到近三万人的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20年代初期,上海纺织工业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各行各业先后形成,这一时期的纺织产业工人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此后,历经抗日战争期间的曲折起伏,到新中国成立时,纺织职工队伍为23.88万人。<sup>③</sup>另据1929年的统计资料,当时的棉纱、缫丝和棉织工人已达19.15万人,其中女性工人有14.39万,占76%。<sup>④</sup>尽管女性工人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是艰苦而缺少保障的,但却改变了数千年来女性无法走出家庭的命运。女性以一个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

女性的职业化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将会为性别文化的建构带来本质的变化。中国的近代化、都市化,为中国女性群体提供了社会参与、性别角色发生变化的外部条件,女性比较有规模地脱离了对家庭的人身依附,实现了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转变。因此,考察女性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如何参与社会,或者说,如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以称得上“参与社会”,还有一个

① 曙梅:《上海妇女的生活》,《新妇女》第一卷第一号,1920年1月1日。

② 陈雁:《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形成》,《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③ 上海纺织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纺织工业志·总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考察女性是如何不再囿于家庭,进入社会层面的,或者说,只有女性中的职业化群体的出现,才使得女性社会参与程度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才有了女性文化构成都市文化值得探讨的基础。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女性对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女性在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之后,对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贡献和表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也是都市性别文化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上述的看法,已经在头脑里徘徊了许久,但同时又有许多的困惑。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并不像如今新时期的女性,会表现出外在的强势;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职业并不固定,说得好听点,是“阶段性就业”;还有,相当一部分从农村初进城市的女性,是以小贩和帮佣的身份进入职场的,这算不算“职业女性”?而且,这些比较底层的女性,几乎很少被主流文化记载,缺乏第一手的史料。当笔者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竹枝词与都市性别文化”时,曾与程郁教授多次讨论过这些问题。她当时正对中国妇女史和口述历史的研究着迷,于是,她提出带着学生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采访那些在解放前就在上海工作过的女性,让这些如今还健在的,八九十岁的奶奶们,说说她们过去的生活和经历。

“老上海妇女口述史”的工作是很艰辛的,除去口述史研究中的重重困难需要克服,还有这些老人的健康状况,也是决定访谈能否成功的关键。“做口述史要和时间赛跑。”但随着一篇篇采访记录定稿,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则凸显出来。正如程郁教授在访谈报告中指出的,上海职业妇女遍及工商业、学校、医院,既有在租界外国人家中帮佣的劳动妇女,亦不乏女知识分子;此次收录的访谈者,有1949年以前就成为职业女性的教师、职员、护士、商贩及家庭服务员,还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和农民。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老上海妇女”个案,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上海都市文化建构中的女性生活和特征。

尽管本书中的受访女性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以及个人的命运遭际千差万别,但却有许多时代的印记和共同特征。例如,不甘心因循守旧的传统家庭生活,渴望读书,渴望改变,渴望工作。其中,职业的吸引力是极大的。叶

秀宝的回忆中,有大量的篇幅叙述她从婆婆家中跑出去,进工厂去做工的经历,有了工作,才使她摆脱了童养媳的痛苦生活;所以,当新光厂整顿时,她被“疏散”,回到家,妈妈说:“那么大的小姑娘都出嫁了,你就不要去做了。”叶却说,“我是有理想的,不要在乡下种田”,“我不肯拿那八十多块离职费,在家里只蹲了一个多月又回到上海”。另一位后来成为地下党员的女性回忆当时坚持要读书的理念,就是不要“当花瓶”。这些非常朴素的想法,实际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人生价值的朦胧认识和坚持,而工业化、城市化的机遇促使她们最终有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书中被访的女性,都有着坎坷的人生。她们有家庭,有子女,特别是那些普通的劳动者,读她们的故事,你会感到那种直面生活、忍辱负重、勇于担当、克勤克俭的内在坚毅无处不在。这其中,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更有上海近代化都市化过程中女性的新表现。这些被访的女性,几乎都是各自家庭中的主心骨。虽然许多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她们学习新事物、新知识的积极性,以及她们的勇敢和智慧,则不断体现在应付生活的一面。每当家庭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这些女性就会挺身而出,就像郑玉英那样,先在私人作坊打工,巴巴结结努力攒钱,养活老家的子女和老人,后来又在街道托儿所工作,认真负责地当孩子们的“阿姨”;托儿所裁员,她又转到街道盛泽织帽厂工作,直至退休。在拮据的日子里,她心态平和,教育孩子们好好读书,她的想法也表达得非常质朴:“我们做工人的总归闷头做工作,心里就一个念头,把这份家当创造出来。”这些把家当创造出来的女性,也在创造中赢得了价值和地位。

值得一提的还有杨秀英的故事。这位在上海外国人家家庭做家政服务的女性,把自己的经历叙述得绘声绘色。童工出身的她聪明好学,在外籍居民家中服务的同时,学会了许多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俗,还表现出语言天赋。她说:“我没文化,但学外语总是非常快,也讲得很好。小女儿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读俄语,最初她的发音蛮生硬的,我一个一个给她纠正,后来她考全班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小女儿要考大学,老师劝她考德语,因为德语与俄语的发音挺相像的,果然她一考就考中了。后来女儿到德国留学,又嫁给德国人,在那边开了饭店。我到德国去玩,又很快学会讲德语,家里

如果来个讲俄语的客人,女婿马上就叫我去陪,大家都很惊奇,这个中国老太怎么俄语讲这么好?”一个从平凡生活中走过来的上海女人,竟然还在晚年充当了国际交往中的友好使者,她自己也觉得骄傲。杨秀英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在上海普通女性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她回忆“文革”中进工厂以后,有学习的机会,语气是那样地欢愉:“有书读我最开心了,何况还不用上班。一开始教室坐也坐不下,但许多人一读书就打瞌睡,宁肯去做生活,于是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两三个人。我坚持到最后,前后读了两三个学期,主要是识字,也学学算术,学到一定程度,还要背《毛主席语录》。”

这次采访的女性,从数量上说,是工人、农民和普通的劳动者居多,也有地下党员、干部和女知识分子。在她们叙述个人生活经历的同时,许多细小的环节也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风尚,折射出大众生活领域中不为人关注,或者不为主流文化关注并记载的性别特征。笔者以为,这恰恰是这项工作成果非常珍贵的一部分。例如:

叶秀宝叙述在工厂做学徒培训:“学徒期间我们只有十三块钱津贴,当时钱也没有当月发给我们,都被老师拿去了,听说她利用这些钱还开了一家杂货店。做学徒满三个月,我才拿到三十九块钱,就用那点钱买了一斤小囡牌绒线。”为什么拿着好不容易的津贴,却去买了一斤“小囡牌绒线”?因为小囡牌绒线已经是当时有名的品牌绒线,自己打毛衣,也是当时一种时尚的生活,从农村的小姑娘变成城市工人,穿着自己挣钱自己打的毛衣,其实是一种城市身份的象征和认同。

叶秀宝又说,解放了,“工资改革以后,我和许多熟练的挡车工一样,定为八级,拿八十三块六角,我们厂长也只得一百多块,而漂染车间和内衣车间虽然男工多,都没我们工资高……解放初为了帮助工人找对象,还学苏联人开舞会,上海几个钢铁厂没有女工,所以常拉我们厂一起跳舞,但我们厂的女工看不起他们,不要他们,因为他们只拿六十多块。所以当时找对象,纺织女工蛮吃香的。我们厂的小姐妹要么嫁给内衣车间的男工,要么到外面去找,一个小姐妹嫁给一个在南京路工作的职员,家里还有房子呢。”这段回忆,仅从工资的差距,就可以折射出纺织女工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另一位当过纺织工人的陈雪梅说起她恋爱结婚的事说:“我丈夫叫曾嘉

禾,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弄堂,他比我大两岁,那时广东人规矩很大的,我们虽然从小认识但从不开话。长大以后,双方家长带我们在一起吃一顿早饭,就算建立关系了。当时约会一般是看场电影,或到外滩公园散散步。刚认识时,丈夫在南华酒家当厨师,看场电影也很不容易,一般到美琪大戏院看下午2点钟的电影,约好1点半在大兴公司门口见面,而他要到2点钟才能下班,往往要我等他半个多小时,一个小姑娘站在那里,时不时还有二流子上来搭讪,每次都弄得我很生气,正准备走了,他却赶来了。就这样谈了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那年我二十一岁。”你看,约会的时候,女方等男方,颠覆了许久以来上海女性恋爱时的形象。

陈雪梅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说到她兄长的婚姻:“经人介绍找到一个在电话公司的小姐,她负责接外国来的电话,工资比阿哥还多,结婚时所住的房子也是电话公司分的。”可见职业对女性发展的重要性。

访谈对象将城市的工人(特别是纺织工人)作为重要的群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近代纺织业的发展来看,上海在20世纪初就渐渐成为引领全国时尚产业的时装之都。大型百货公司、知名制衣店铺骤增。据记载,1946年上海的时装公司已达二百二十八家(外国人开的尚未计入),主要集中在同孚路、林森(今淮海路)、静安寺路、湖北路、福州路、北四川路、浙江路和南京路(其他路段也有零星的时装店,但一般均在五家以下)。时装业总资本额约达182亿2450万元(法币),折合黄金为10169.922两<sup>①</sup>。纺织业和服装业,都成为扬名国际的时尚产业:“时样新装称柳腰,中西合璧市招摇。方今俭朴开风气,莫被欧人笑服妖。”(《服妖》,余槐青《上海竹枝词》)<sup>②</sup>“新式衣裳孰剪裁,这般窄小不应该。尚逢腹内孩儿大,纽扣全然纽不来!”(朱文炳《海上竹枝词》)<sup>③</sup>可见,女式的时装和消费已是重要的商业领域。时装业的兴起,同样也可以佐证女性“出客”与社交活动的增加,也包括职业服饰的需求大

<sup>①</sup>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时装商业同业公会会员清册》,全宗号:S243-1,案卷号:9-10,1946。

<sup>②</sup> 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二,上海卷,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sup>③</sup> 同上,第15页。



大增加。甚至不少有名的画家也参与设计。<sup>①</sup>

作为工人群体的女性,虽然不能算是时尚消费的重要群体,但数量较大的女性群体,却又是服装消费者中最基础的群体。而这些第一手的资料,也源自口述历史:“有些女工们的服装,比较考究点的,尤其比较有知识点的女工,很多的被人叫做‘学生派’,因为她们大都是长旗袍皮鞋,到冬天外面加上一件绒线外套,插上一枝自来水笔,完全像读书的学生一样,特别是江南各县,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各女工喜欢这样打扮,江北籍的女工在服装上和江南人不大相同,她们喜欢穿红红绿绿的绸衣,浅口子的绣花鞋、粉红袜子等花花绿绿的衣服。”<sup>②</sup>虽然女工群体仍然贫困,但她们向往新生活的愿望和文化需求和愿望也十分强烈,“学生派”的装束证明了这一点。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职业机会,多少给了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年轻女孩子以希望和空间:“或是缫丝或纺纱,斜阳工散各回家。手提饭盒梳妆俭,七八娇娃一小车。”(朱文炳《海上竹枝词》)<sup>③</sup>因为女工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所以,她们与丈夫和公公、婆婆的相处也打破了原先的格局,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一部分工余时间,并用自己的钱来进行文化娱乐性的消费:“我们不仅去看戏,而且有时在车间我们也唱戏。”<sup>④</sup>同时,丈夫也开始承担家务:“只要谁有空或第一个回家,谁就烧饭。”<sup>⑤</sup>

这些潜移默化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形成,构成了上海的女性文化。女性文化,包括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女性群体对新生活的需求以及她们对上海都市形成的贡献,是上海都市文化构建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老上海妇女口述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珍贵的史料提供了性别文化构成的细部,以及传统的两性关系悄然变化的过程。虽然只是个案,但却是人口众多的普通女性的缩影。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发表以后,

① 参见张竞琼等:《上海近代服装设计师的设计方法》,《东华大学学报》2010 第 2 期。

②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二章,棉纺织业,远东出版社,1939 年,第 81 页。

③ 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二,上海卷,第 15 页。

④ [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50 页。

⑤ 同上,第 142 页。



人们就把他所描述的文化现象归结为上海都市文化,并认为这是上海都市文化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近代化的过程告诉我们,上海市民文化素养的新变,新型都市文化的人气和日益国际化,并不是文学本身可以承担的,相反,文学只是一种镜像,并进一步巩固已有的习俗和理念。真正决定文化本质的,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以及人们对新生活的愿望。曾经的“海派”文化不仅仅是“小资”的,也是大众的、市民的。与传统文化精英化的特点不同,海派文化的这种大众生活文化属性,是和上海都市形成的需要分不开的。上海与吴文化的传统最接近,但是,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上海逐渐形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市民化的特性,城市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求新求变,就成了上海都市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题。一百多年来,上海社会结构伴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市民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的大众不断接受新事物,不断容纳新文化,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向往更新、更美,这是上海都市文化能够与时俱进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现层面是生活文化,要寻求上海都市文化的要素,解释上海城市的性格,就必须将视角移至大众的、生活的层面,而活跃在这一层面的,恰恰正是女性的群体。

## 于无声处

### ——有关妇女口述史访谈的实践与理论

程 郁

由于传统社会的长久压抑,妇女成为失声的群体,尤其在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她们的身影,而口述史是近年兴起的新方法之一,为近现代妇女史研究所采用。多年前笔者尝试在妇女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的方式,那时便想到采集解放前就业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这个题目,我也意识到这是非常有意义又紧迫的工作,但还是一再搁置。

考虑到这些妇女大多已届八十五岁以上,正在加速离我们远去,因而抢救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自2010年中开始,尽管未得到任何基金的资助,笔者决定开始行动,在独自寻觅采访一年之后,2011年组建了一个八人团队,在2012年初获得上海市教委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支持,又获得朱易安教授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竹枝词与都市性别文化”的资助,访谈得以全面铺开。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找到二十位合适的采访对象。由本次调查来看,上海职业妇女遍及工商业、学校、医院,既有在租界外国人家中从事家政的劳动妇女,亦不乏女知识分子;从其解放前的职业来看,已采访的对象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计有教师四人,职员一人,护士一人,商贩及家政服务人员各一人,农民三人,作坊女工一人,纺织女工八人。上海开埠后即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因而女工理所当然占解放前就业的上海职业妇女的半壁江山,更由于上海曾是我国最早的纺织大城,纺织(包括制衣)女工自然成为采访对象的重头。她们工作的场所既有国营大厂,亦有本地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私营厂,更有两名曾在原日资企业工作。

在多年的访谈及整理工作中,笔者产生许多困惑与经验教训,汇报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 一、在中国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新史学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早在上世纪中叶,口述历史已为主流史学界所接受。1948年,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及全世界,如今美国各地图书馆及主要大学图书馆都保存大量口述史成果。<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都有口述历史计划,而历史学家的目光也已从精英转向“来自底层的历史”。

海峡对岸也很早就开展了口述历史的收集,而且早已为主流学术界所接受。这项工作主要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自1959年以后,主要以政、军、外交、交通、财经、学术界人士为主要对象,共访问千余人。其中与妇女史有关的成果有《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记录》(1994年)、《女青年大队访问记录》(1995年)、《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记录》(2004年)等。<sup>②</sup>

① 据[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② 据中研院口述史网页,《开创与发展》,http://140.109.152.48/oralhistory/index.html。